

一、引言

世纪交接，岁月更替，人们常常在这样的时刻，有所回顾，有所前瞻。当前恰逢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关键发展阶段，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正处于一个全新的转型期，为使这种回顾与前瞻不至流于泛泛，并由此生发出一些深沉之思和长远之计，解答当代中国人共有的困惑——“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又将向何处去？”以社会现代化理论，对 1840 年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艰苦卓绝的历程，从新的视角进行一番再回首，当会不无助益。

我们在这本书中所要论述的是 1840 年以来，古老的中国所经历的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惊心动魄的冲撞和变迁。中国人民、无数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争取国家的独立，为振兴中华而英勇奋斗，使中国的历史发展终于挣脱了治乱相替千年循环怪圈的缠绕纠结，全面汇入了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

社会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进程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已有过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发生在约 100 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之后演变成人类；第二次革命性的转变发生在约 5000 年前，人类从原始蒙昧状态进入了文明社会；第三次革命性的转变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的一个过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地区，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这第三次人类历史上的大转变就是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是当今世界所有的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最不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①它是当代世界历史一种连续的演进和一个长期、复杂、多层面的渐进过程，即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社会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在 E. 迪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迪尔凯姆的《社会的劳动分工》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两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别是通过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比较，提出了当今现代化理论的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随着现代化在全球的扩展和弥散，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一批学者创立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架构。以 T. 帕森斯为首的结构功能学派，特别是 W. 罗斯托 (Rostow)、D. 莱勒 (Lerner)、N. 艾森斯塔德 (Eisenstadt) 等人，在其中有很大的贡献。70 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各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成功，亚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 页。

洲学者总结各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也对现代化理论的充实、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著名的如日本富永健一的《社会学原理》、中国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都是很富创见之作。概括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世文明。随着社会生活的普遍理性化及人类役使自然能力的提升，势必极大地改变人类生存状况，从而对人类的价值世界发生深刻影响。社会现代化理论在其形成、发展、不断丰富过程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影响，逐渐成为一个包含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各社会科学内容的综合性理论体系。^①其要点包括：第一，强调人们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信仰在决定社会类型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价值观的转变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条件。第二，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并非一种只能在西方产生的现象，而是可以在全世界的发展中普遍见到的。^②第三，改变传统行为模式的社会变迁，是在现代化的推力中发生的。这种首先在西方社会逐渐形成的推力，相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尽管不可能由其内部自发产生，但却可以通过向西方学习及其自身的体悟过程而获得这种推力。第四，这种“靠学习与接受（传播）而现代化”的过程，应当不妨碍后发展国家自身各种特征的发展。这包括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城市化，发展教育以扫除文盲及进行职业培训，发展大众传媒以传播思想和促进社会意识的发展，提高政治觉悟及对民主的参与，通过提供投资而增加就业机会，以立法代替在传统效忠观念

参见丰子义：《现代化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引言部分。

参见N.艾森斯塔德：《社会的进化与发展》，英国珀加蒙出版公司1966年版，第1—4页。

基础上建立起的权威模式等等。第五，不同的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为各国被现代之光照耀的程度不同，在输入现代化特征方面就有成功性大小之差异。第六，不发达是发达的前夕，世界各国都正在也必须向着现代化迈进。后发展国家的不发达状况，除了其自身历史上存在的障碍外，主要是由于它们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关系所造成的。第七，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消解这些矛盾冲突的最佳途径，是加速变革和发展。

同以往人类历史的两次大转变不同，现代化不可能在各个地域或各个民族相互隔绝、彼此孤立的状态下个别地实现，而是具有世界性的弥散、扩张的性质。它是在地球的某一个区域首先获得突破，而后以血与火的洗礼形式强行扩散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人类历史上，现代化首先从西欧开始，随之即通过殖民侵略波及、扩散到美洲、澳洲、亚洲、非洲的广大地区。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的起步时间和启动方式是各不相同的。美国社会学家 M. 列维将其归纳为两大类型：“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晚发外生型”现代化。前者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是英、法、美等国，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早在十六七世纪即已开始启动，而其最初的启动因素又都源自本社会内部，是其自身历史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后者中的典型个案有德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当今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在其中，它们的现代化大都在 19 世纪才开始起步，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①很显然，中国的现代化是属于“晚发外生型”的，我国是从 19 世纪

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19—23页。

中叶才开始被迫进入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进程。在这其中，来自西方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因素。

现代化发展具有很鲜明的阶段性，对此国内外学者都有过不少精到的阐释。其中著名的有罗斯托（W. Rostow）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说^①及美国学者布莱克（C. E. Black）对现代化发展阶段的设定。布莱克认为所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必定面临以下四个阶段：第一，现代性的挑战——现代观念和制度、现代化拥护者的出现，这一切使社会在传统知识范围内遇到最初的抵抗；第二，现代化领导的稳固——权力从传统政治领袖向现代领袖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尖锐的革命斗争通常持续数代人之久；第三，经济和社会转型——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达到这一程度，社会从农村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第四，社会整合——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导致了整个社会基本结构的重组。^② 罗荣渠教授在分析 1949 年前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具体情形后，在其《现代化新论》一书中提出了其著名的“四重奏说”，即以“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与“现代化”来表达这种变革的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存在独特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与国际环境，是始终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的。

^① W. 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非共产党宣言》，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6 页。

^②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0 页。

现代化——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

现代化既是全球性的世界潮流，又是 19、20 世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或主动或被动走上的既有发展过程。以科技革命、知识爆炸、工业文明为主导因素，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先导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具有无限弥散性和扩张性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动所谓的文明制度……^①

1840 年后，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强大冲击下，中国出现了以大规模的社会解体和文化解体为特征，并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变乱的局面。

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使得中国社会只能顺应世界潮流，选择新的发展道路。走向现代化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落后就要挨打，抗拒现代化潮流就意味着灭亡，中国要生存、发展，中华民族要重新复兴，只有选择走向现代化。

1949 年前的中国，始终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前期。外部世界的挑战一直存在，社会内部现代化的因子和集团也一直在凝聚。国民的基本温饱、民族的独立生存、社会的统一安定等问题长期重叠并存，使保证整个中华民族的即时生存成为了中国现代化所不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69—470 页。

容回避的焦点。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后，为了在变迁中的社会里形成统一的全国经济和政治网络，加强国家内部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以应付外来挑战和内部危机，并为未来的经济起飞、社会进步创造必备的前提，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这也是世界所有国家现代化早期的普遍法则。因此，从 1840 年到 1949 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主题，就是摆脱总体性的民族生存危机，实现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的权力转移，重新平衡社会资源配置，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高效率的、开放的政治共同体，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和社会文明结构的全面转型提供现实基础。

1949 年后的中国，则在具备了这样的现实基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现代化发展的全新时期。尽管其中充满了曲折反复，也有过不少失误，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毕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逐渐步入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运作背景

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题，中国从 1840 年以后就开始是被迫后来是自觉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运作背景是十分复杂和严酷的。作为“晚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既存在着后发展国家普遍遭遇到的困境，也有着中国特殊国情下的沉重包袱。这种复杂、严酷的背景突出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第一，巨大的人口过剩压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一向是中国人足以自傲的本钱，但实际上相对于数量极众的人口，中国根本谈不上地大物博，在现代化启动阶段，众多的人口和悠久的历史又恰恰是

我们的劣势。19 世纪初中国的人口就已突破 4 亿大关，已达到旧的生产方式和自然中国环境能够负载的极限。此后，尽管天灾人祸、战乱频仍，人口增长速度一直很快，到 1949 年，中国人口已有 5.4 亿。^① 这样众多的人口，使中国的自然资源长期相对稀缺。从 1400 年至 1949 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几乎没有增长，这是最典型的例子。^② 人多地少的矛盾是长期困扰中国、影响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中国现代化在如此的自然历史背景下启动，其初始条件的严酷，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这迫使中国长期将国计民生的重心滞留于应付基本温饱上，而且始终无法摆脱来自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民的潜在性动乱威胁。第二，亡国灭种的民族生存危机一直困扰着中国。1840 年以来，中国面临的外来威胁、挑战与压力也是罕见的。民族的生存和国家尊严始终处于外来威胁之下，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深重的耻辱。这种状况激发和深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但这种民族主义对现代化进程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对这一进程发挥了具有魔力般的社会动员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时常淹没了现代化，并使之偏离主航道。第三，政治衰败、国家分裂的乱世局面。世界上凡是现代化进程成功的国家，一定有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高效率政府。而中国现代化启动之时，正逢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到了极致，根本无力担负现代化进程领导核心的重任，而且直到 1949 年，中国也没能形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领导中枢。政治权威和权力的危机、社会认同和整合的危机、文化道德失范与脱序的危机相互交织成全面的社会危机，长期困扰着中国，使中国社会的动

参看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 10、第 11 章，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参见 D.H.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 年）》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引言部分。

荡变乱一直未能平息。这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能在充满暴力、欺诈、腐败的无序状态中踉跄前行。总之，在这样一个复杂、严酷的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难以抓住机遇取得应有的长足发展，而且在应付来自西方的挑战时也显得迟钝犹豫。“内部事务万分火急，至于西化则可以暂缓一步。”^①

以社会现代化理论重新观照、 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

当中国近现代社会在上述复杂、严酷的背景下，多方面功能失调，所有的温和改良对缓解全面社会危机都无济于事，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又受制于社会政治层面的全面社会危机时，为了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为了摆脱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和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为了彻底改变中国现代化运作的复杂、严酷背景，社会革命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和必备的前提了。

我们在此所使用的社会革命概念，指的就是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所发生、发展着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的过程，即中国的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变革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矛盾、斗争的发展及其运作规律，革命与变革势力改变旧的社会结构、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努力。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同时具有创新和破坏作用的过程，它既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可能使人类付出混乱和痛苦的极大代价”。^②我们所说的社会革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2 页。

②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 页。

命，就是要打碎旧的社会体制和结构，就是要创建新的社会制度，其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始终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内部的封建势力，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作为“晚发外生型”的中国现代化，其面临的最主要障碍是来自外部的威胁和来自内部以封建势力为代表的旧传统的抗拒。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一个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一个较安定的社会局面，需要一种全民的社会动员和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高效率的政府。在近现代中国要想扫清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提供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基本前提条件，惟有进行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这样，在这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条件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革命，就具有了与现代化进程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革命也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必备的发展前提。

从 1840 年开始的近现代中国社会革命的历程，同时又是中国由被动的现代化转向主动的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这 100 多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革命运动与社会乱局，所出现的所有社会危机与社会变革，其实质都是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各种政治力量，以各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相互之间既合作又斗争，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中国现代化发展范式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诸层面的现代化因素不断累积的过程。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所有阶级、阶层，各种政治集团，几代先进的中国人，在这一过程中，都对现代化这一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作出了各自的回应与抉择。从洋务运动对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的追求，到戊戌维新对政治制度层面现代化的向往；从辛亥革命开始对政治社会体制作适应现代化发展所需的根本性变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的探索；从国民党单纯城市化、

工业化和国家资本主义化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取向，到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以彻底实现国家统一独立、民族解放、建立全新的社会制度为首选目标的崭新现代化发展模式，最终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最新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认识一步步地深刻、全面和系统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发展也终于步入了良性循环的正轨。

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所造成的冲击和激荡是剧烈、深刻而又广泛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所有阶级、阶层，所有的政治集团和利益共同体，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都必须作出各自的回应与抉择。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斗争，一切的社会冲突与社会危机即中国革命之所以产生、发展的根源，都是围绕着对现代化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究竟选择何种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从太平天国革命的“上帝观”到义和团运动的“反洋教”；从戊戌维新的“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到国民革命的“打倒列强”；从国共的合作到国共的分裂与内战；从全民抗战的实现到国共关于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从中间势力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彻底社会整合；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及由计划经济模式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新发展范式的转换，中国革命历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重大事件，其实质都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各种政治集团和利益共同体所必然作出的反应以及它们彼此间产生的冲突与对抗、矛盾与斗争。

走向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然而这不仅是物质文明

的复兴与繁荣，也是精神文明的重建与发展。从根本上说，现代化对中国意味着制度的不断创新，意味着一种中华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基于上述这样一些认识，就必须以一种新的“现代化范式”来对 1840 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进行重新审视与观照，建立起一个能适应当前中国社会和经济大转折时期的知识话语体系。这也即是说，要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要建立起一个包括社会革命在内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来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大变革作出新的客观定位。这正是我们力图尝试的、富于挑战性的工作。

回应挑战——无法“告别”的革命 与不可避免的变革

近 20 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飞速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在为早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奋斗的同时，已经前所未有地普遍享有着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丰硕成果，“抓住机遇，加速发展，早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成为举国空前一致的共识，这是极为令人欣慰的。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有漫长、曲折的路要走，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完全的现代化国家。随着现代化发展步伐的加快与深入，我们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也面临着一系列新困难和新挑战。今后现代化发展带给中国人民的不仅仅是新的机会，而且还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全新挑战，诸如社会的暂时失序、个人安全感的丧失、传统道德信仰体系的崩溃与新道德行为社会规范重建等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反思的社会思潮。“以史为鉴”是中国的悠久传统，近年来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新认识和审视，也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反思中出现了一种“告别革命”的观点。这种观点从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重新认识入手，认为近现代中国的社会革命和激进主义，阻碍、迟滞甚至破坏与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丧失了几次绝好的发展机遇，因此，对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中国激进的革命运动都加以否定，提出要“告别革命”。这种观点，既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更对传统的中国革命史学科体系提出了直接而有力的挑战。

这样的挑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而旧的单纯以阶级分析、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两个过程”和“若干次革命高潮”为基本内容的中国革命史学科体系，尽管也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已无法很好地回应这样的挑战。要对此作出正面的回应，必须以社会现代化理论为指导来重新建构中国革命史的学科体系，以中国革命之所以产生发展的历史事实，详尽、切实地论述中国革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促进作用，令人信服地阐明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靠上纲上线贴标签、“大批判”，是不可能驳倒这一观点，也不可能正人视听的。

在本书上卷中，我们力图把社会现代化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来作为理论指导，对中国人民多年的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加以实事求是的论述，建构新的学科体系，希求令人信服地解答下列问题：第一，中国革命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动力，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样的革命是不可避免也无法“告别”的。第二，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随着历史的发展，必然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中国现

代化进程发展的选择，是历史 and 人民的一次最新选择。第三，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在目标选择和价值取向上的一致与重合，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确立。但制度创新与现代化进程一样，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渐进过程，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来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世界上迄今也没有任何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共同体），改革也就从这个制度确立之时起，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这是不可避免的。第四，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难以抗拒的历史潮流，具有人类社会必须共同遵循的运行法则和价值观念，诸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工业化、城市化等等。但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决定了现代化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作为“晚发外生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尽管西方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启动因素，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却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更为关键的因素。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西方示范效应与中国历史遗产张力共同起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渐进过程。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必须首先顾及的因素，而对外开放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二、巨变前夕的中国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得以展开的内在背景

前现代化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家族取向的社会。这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层面上都带有浓厚的中国数千年延续不变的传统色彩。尽管就农业文明的发达程度而言，这种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社会结构已达到了其发展的极限，具有高度的成熟性，但从中却产生不出真正推动现代化生长的内源发展因素。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前现代化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

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几乎全都是农业部门，其他的部门或是需要依赖农业提供原料，或是处于为农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地位，手工业大多是一些棉花、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加工业，商

业也主要是从事食物及衣着的市场分配。只有一些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极小比重的行业，如矿冶业、建筑业与政府服务部门才不需要靠农业提供原料。农业生产类型仍然是靠人力为资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农业生产技术则停留在几个世纪前的水平上，虽有点滴的改良，但在总体上却无任何突破性的进展。农业的增长潜力早在几个世纪前已被挖掘殆尽，这一时期农业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大量投入劳动力去精耕细作。农业耕作的集约化已到了现代经济学所称的“边际收益递减”的程度，陷入了一种“高水准均衡的陷阱”。^① 人均粮食产量很低，农产品的大部分为农业生产者自己所消耗掉，可供市场的剩余产品是少量的。这种农业经济只限于维生的水平，大大阻碍了手工业和农业自身的发展，也使得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城市难以出现于中国。这一时期，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乡村，城市居民占的比重很小。而此时的中国城市，其主要功能体现为政治行政中心和军事要塞，城市的规模大小和重要性取决于住在城市中的贵族的品级地位的高低。城市居民大都为贵族官僚及其家族，还有一部分是为其提供服务的人们，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为数甚少。由于受到社会价值观和农业技术水平的限制，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土地利用形式都未出现新的变化。土地占有的零散化和土地耕种以农户为单位的单独化是两大不变的特色。

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手工业已相当发达，这些手工业的生产形式多样，较普遍的是相对原始的家庭手工业和手艺式手工业。家庭手工业主要表现为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的形式。这是前现代化中国维生经济的典型形式。农民要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单靠农业是不行的，非依赖家庭手工业的支撑不可。手

黄宗智：《华北小农社会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62 页。

艺式手工业在商品生产较不发达的偏僻地区较通行，主要存在于如铁匠、木匠、织匠、鞋匠等特殊行业中。在江南等商品生产相对发达的地区，已出现了较高级形式的独立经营的手工业。手工工场在纺织、制陶、制盐、采煤、制茶、冶炼、造纸等行业有了很大发展。在传统工艺范畴内，这些行业的技艺都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甚至已达到传统工艺的峰巅。但从组织形式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未萌芽。因为这一时期尽管出现了大量雇佣关系，但雇主对雇工既未通过组织关系加以控制，也未通过一体化生产将其联系在一起，况且雇佣关系早在明清以前就已出现于中国社会。

这一时期的商业也已相当发达，商业资本对手工业的渗透也已很普遍，不过商业与手工业的区别还不很明显，手工业者与商人的界限也较含混。按一般规律，商业的发达是以手工业的发展为前提的，但这一时期中国的商业发展却快于手工业的发展。这种中国独有的特点，是因为数量极众的农民的存在，使生产能力的缺乏未构成对交换的决定性障碍，并对扩大商业规模起很大的作用。各地的市场都有所发育，其中江浙地区已有了基本摆脱族权控制、具备较大开放度的相对成熟的市场，其手工业生产、商业与货币流通等各方面的发展基本上和区域化大市场即二级市场同步，并形成了一些从事专业化生产的新兴市镇，如吴江的铁、嘉定的布、盛泽的丝等。国内贸易除原有的南北两大干线（即分别由赣入粤和由湘桂入粤）外，这一时期又开辟了沿海航线（由江浙沿海经山东半岛至天津）和沿长江航线，大大扩展了国内贸易的地域范围。而市场交易的商品主要是粮食、棉花及其制品、丝及其制品、茶、盐、铁、陶瓷、铜等生活必需品。商品交易的流向也基本上是由乡到城的单向性的，整个市场仍是一种以粮食、